

“两个伊万”的故事

——巴别尔短篇小说中的果戈理传统

谢春艳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150001)

提 要: 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巴别尔是受果戈理的创作影响至大、影响程度最深的作家之一。《骑兵军》中的经典篇目《两个叫伊万的人》与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之间存在很多相互关联的写作方式。从主题内涵、情节模式到人物形象, 两部小说之间明显存在着直接或显性互文关系。对比两个文本间的叙事模式, 分析其中的互文关系, 可以揭示出巴别尔小说的多重话语内涵, 进而深刻认识巴别尔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叙事方面的贡献。

关键词: 巴别尔; 果戈理; “两个伊万”; 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巴别尔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种“特殊”的原因之一是批评界普遍认为, 巴别尔的创作与西方文学之间存在着种种渊源关系。尽管如此,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俄罗斯学界即已论证了巴别尔短篇小说的创作思维和审美意识对于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列斯科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есков, 1831—1895)和契诃夫传统的继承问题, 确定了巴别尔的作品与俄罗斯文学、文化的直接联系。高尔基和爱伦堡尤其强调指出, 巴别尔与《塔拉斯·布尔巴》的作者果戈理的创作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 对于巴别尔创作的本土文化内涵问题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说法。

俄语中有一句经典类似绕口令的表达意在言外, 耐人寻味: “不要将果戈理与黑格尔、黑格尔与倍倍尔¹、倍倍尔与巴别尔混为一谈”。²这句话常被人引用, 借以说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在知识结构方面所应达到的最低水平。在这里将巴别尔与果戈理相提并论绝非偶然。除两者的姓名在读音和写法上极其相似外, 在某种程度上否定果戈理与巴别尔的联系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伊万”是俄罗斯男性最常见的名字, 也是《神苹果和神水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молодильных яблоках и живой воде)、《农民的儿子伊万和怪物》(Иван —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сын и Чудо-Юдо)、《母牛之子伊万》(Иван — коровий сын)等许多俄罗斯民间故事里的主角。“伊万”这一名字源于古犹太语, 意为“上帝宽恕的人”。在俄罗斯民间口头创作中貌似蠢笨、弱小、无能, 实则大智若愚、深藏不露的“傻瓜伊万”的形象屡见不鲜。列夫·托尔斯泰曾写有童话故事《关于傻瓜伊万和他的两个兄弟的故事》(Сказка об Иване-дураке и его двух братьях, 1886), 高尔基也写过《傻瓜伊万努什卡的故事》(Сказка про

Иванушку-дурачка, 1916)。果戈理则借中篇小说的体裁形式，以现实人物为基础创作了《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том, как поссорился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 Иваном Никифоровичем*, 1834）（以下简称《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

根据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一切文本都是二级文本，都是在另一个文本之后产生的，一切文学肯定都具有互文性。”（蒂费纳·萨莫瓦约 2002：115）简言之，任何文本都是在前人作品的遗迹或记忆的基础上诞生的。每一部新作都或多或少受到前文本的影响。由此，新作品与其前文本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 1922—1937）中的经典篇目《两个叫伊万的人》（*Иваны*）与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之间存在很多相互关联的写作方式。对比分析两个文本间的叙事模式与互文性关系，可以从中解读出巴别尔小说的多重话语内涵，进而深刻认识巴别尔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叙事方面的贡献。

2 题材的相似性

在《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中果戈理用幽默的笔调展现了两个地主流常、无聊、空虚、卑琐的生活：“两个罕见的人，两个罕见的朋友”——两个伊万“生活在令人感动的友谊之中。”（果戈理 1999：331）他们的友情甚至令周围人称羨不已。然而，有一天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因一件小事骂了伊万·伊万诺维奇一句“公鹅”，这对“尽人皆知的形影不离的”、“一对世上少有的好朋友”便开始了激烈的争吵。双方据理力争，互不相让，发展到反目成仇的地步，并因此最终对簿公堂，直到他们年华垂暮，耗尽家产，恩恩怨怨十几年，无果而终。《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与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一同被果戈理收入到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Миргород*, 1834—1936）中。虽然，这篇小说发表的时间早于《米尔戈罗德》中的其他几部作品，但《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却被放在这部文集中最具分量、最受关注的末尾位置。这种安排显然是果戈理有意为之。

在这篇小说问世之前，已有瓦西里·特罗菲莫维奇·纳列日内（*Васил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Нарезный*, 1780—1825）的长篇小说《两个伊万，抑或诉讼癖》（*Два Ивана, или Страсть к тяжбам*, 1825）发表。这部作品所描述的也是外省地主无所事事、慵懒无为的生活画面，写了两个叫“伊万”的朋友之间无休止的纷争，进而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的故事。果戈理的《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与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题目与情节基本一致。但果戈理更加着眼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结构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通过幽默感构成深刻的讽刺力量，使作品饱含更深的哲理思索和理性的启迪。

巴别尔的《两个叫伊万的人》与果戈理的《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具有显在或直接的互文关系。在特写《敖德萨》中巴别尔曾特别指出：生于乌克兰的果戈理为俄罗斯文学带来了滋养万物的明亮阳光。（巴别尔 2016a：7）巴别尔虽然未必对果戈理的创作多么激赏，但可以肯定他认真读过《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这篇小说，并对该作品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这篇小说激发了巴别尔的创作灵感，使其有了“重写”“两个伊万的故事”，并将故事进一步深化的创作欲望。《两个叫伊万的人》与《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题材的相似性和主题的相关性正是巴别尔有意拟写果戈理的小说，以及两篇作品之间呈现互文关系的证明。两者的近似之处是：题目类似，均以两个主人公吵架为核心展开故事情节；两个伊万的性格迥异；叙述者均存在于小说的故事之中。

3 互文性叙事

从主题内涵、情节模式到人物形象，《两个叫伊万的人》与《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之间鲜明地体现出直接互文本或显性互文本的关系。《两个叫伊万的人》写的也是“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但与果戈理的小说不同的是，在《两个叫伊万的人》中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主题也变得更加丰富。《两个叫伊万的人》讲述了在战场上昔日的一对好友彻底

决裂、势成水火的故事，充满戏剧性色彩。助祭伊万·阿格夫和另一个“伊万”——马车夫伊万·阿金菲耶夫本是生死相依的两个战友。伊万·阿格夫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被遣送至惩戒团，后被派往波兰前线，他又谎称自己耳聋，在待命出击的情况下故意畏缩、企图逃离战斗岗位。伊万·阿金菲耶夫奉命押送其到军事法庭去接受审查。不料一路上伊万·阿金菲耶夫寻找各种时机故意捉弄和惩罚眼前这个屡教不改的逃兵，在后者的耳朵上方朝天放枪，试探他的耳聋是真是假，准备随时对他进行处决。无休止的折磨使伊万·阿格夫最终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他“浑身打战，大口吸着气”，哀求随军记者柳托夫替他写封家信，让自己的妻子为自己哭丧。此刻，伊万·阿金菲耶夫窜来窜去，挥舞着双手，扯下自己的衣领，倒在地上，癫痫病发作了。他发狂地喊道：“唉，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唉，你是我苦命的心肝宝贝，你是我的苏维埃政权……”（巴别尔 2016b: 135）两个同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种荒诞的爱恨交织的基础之上。其中一个胆小、懦弱，不幸当了逃兵，另一个则是狂妄极端，强悍骄横的哥萨克，一个残酷暴戾的物种。用小说中医士巴尔苏茨基的话说，伊万·阿金菲耶夫“是一只野兽，心狠毒辣”。两个伊万的命运被战争连在了一起，正如《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在描述两个主人公“是一对世上少有的好朋友”时所言：“魔鬼用绳子将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和伊万·伊万诺维奇拴在了一起，一个上哪儿，另一个也会跟到哪儿。”（果戈理 1999: 271）战争塑造了伊万·阿金菲耶夫的凶狠无情，也令他变得不念友情。他的灵魂陷进了一场荒诞不羁的游戏之中。他时刻用充满警惕和敌意的眼睛紧盯着伊万·阿格夫，想方设法虐待他。后者不堪忍受他的百般刁难、凌辱和威吓，请求枪毙自己。此时，小说另一人物科罗特科夫对伊万·阿格夫所说的一番话令人不寒而栗：“你要明白，你碰到了一个多么好的人。换了别人，早把你像只鸭子似的宰了，让你连嘎嘎地叫一声都来不及，而他这样做，是在弄清你的真相，是在教育你，让你还俗……”（巴别尔 2016b: 135）

在《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中叙述者首先交代了两位主人公之间“很少有相似的地方”：“伊万·伊万诺维奇有非常出色的极富魅力的口才。天哪，他是多么能说会道啊！”（果戈理 1999: 272）但是“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则刚好相反，少言寡语，不过一旦他迸出一个词儿来，那就够你受的：那锋利劲儿什么剃刀都比不上。……”（果戈理 1999: 272）如果说，果戈理将俄罗斯文化中“伊万”性格的矛盾性分别寄予在其笔下不同的两个伊万身上，那么巴别尔作品中的“两个伊万”则呈现了俄罗斯人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伊万·阿金菲耶夫残暴冷血的兽性的一面和伊万·阿格夫善良温顺的一面。在短篇小说《两个叫伊万的人》中展现了可怕的、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尽管他们同名，尽管两个主人公来自同一个战壕，尽管他们曾是“自己人”，但此刻他们却没有了任何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革命立场。他们已经变成了“外人”或“熟悉的陌生人”。这篇小说暗含着整个《骑兵军》的深层寓意之一：俄罗斯已经变为一个人与人之间格格不入，彼此矛盾，互为异己，相互敌对的世界。

4 叙述者形象对比

“叙述者是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是真实作者想像的产物，是叙事文本中的话语”（胡亚敏 1994: 37）《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和《两个叫伊万的人》的叙述者都具有人格化特征，他们同时是故事中的人物，均属于“故事内叙述者”（intradiegetic narrator）（申丹，王丽亚 2010: 79），但他们所述之事都是与己无关的他人的事情，他们仅仅是所述事件的见证人或旁观者。在两部作品中叙述者的形象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是作者的一种创造。

在《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中叙述者“我”在 12 年后重回米尔戈罗德：“那时是秋天，天气阴郁潮湿，雾蒙蒙的，泥泞一片。令人烦闷的、绵绵不断的雨水使旷野和田垅淡淡地蒙上的那层绿色显得很不自在，……这种天气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阴郁的天气使我的心情也变得烦闷起来。”（果戈理 1999: 330—331）但“在这阴晦的、更恰当地说是病态的日

子里”，只有“我”对“两个伊万”的境况念念不忘，内心一直在纠缠于此。“当我的车子驶近米尔戈罗德城时，我感觉到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果戈理 1999：331）叙述者“我”特地赶到教堂去，实在是因这“心跳”太折磨人。可以说，这个“我”是全篇惟一的亮色。“我”在作品中的作用，是以“我”对主人公“两个伊万”的“关注”来反衬周围人的“冷漠”。“我”既与作品中的人物在一起，又站出来，同读者说话。似乎除了“眼睛”外，叙述者还具有了头脑和嘴，他发表议论，谈他自己的观点，仿佛和读者在一起，走进了读者的世界之中：“在我看来，没有一幢房子比得上法院。”（果戈理 1999：298）“在我看来，描写伊万·尼基福罗维奇怎样穿上裤子，别人怎样给他打好领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里只要作如下交代就够了……”（果戈理 1999：325）在小说结尾“我更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的哀叹更表现出“我”对未来的深深忧虑：“又是那一片旷野——有的地方是暗沉沉的坑洼，有的地方呈现着绿色，又是那湿漉漉的寒鸦和老鸱，绵绵不断的雨，灰蒙蒙的哭泣的天。——这世上可真是沉闷啊，诸位！”（果戈理 1999：332）在叙述者的这些“声音”，即叙述者的“评论干预”背后隐藏着诸多价值因素，这正是作为《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的前文本的深刻内涵。

同《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中的叙述者一样，在《两个叫伊万的人》中叙述者柳托夫也是一个对“两个伊万的故事”十分熟悉的知情者。但是与《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中的叙述者“我”不同，柳托夫是与“两个伊万”直接打过交道的一个人物。他在战斗结束后偶遇“两个伊万”的马车。随后亲眼目睹了“两个伊万吵架”的过程。但他只是如同摄像机一般，跟随人物一道行动，没有自己的话语，对两个伊万之间的“吵架”不发表任何评论，这样的文字恰好与巴别尔冷峻的文风相吻合。

巴别尔的叙事有着一种奇妙的冷静，没有褒义贬义，没有肯定否定。小说《两个叫伊万的人》的叙事耐性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撼。作品用零度判断和中性叙事话语讲述骑兵军的红色故事，这种“以少胜多”、简到极致的叙事策略给读者留出了最大限度的解读空间，让读者以自己的审美想象和审美判断去填补。显然，小说《两个叫伊万的人》内在审美驱动的一个重要来源即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所提出的“零度叙事”。

5 结束语

在普希金之后果戈理的出现使俄罗斯文学发生了重要转向。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开始沿着“非普希金”的、“果戈理的”道路发展。果戈理将俄罗斯文学带进了一个色彩斑斓、充满异国情调的世界。如果说乌克兰之于俄罗斯文学，正如普罗旺斯之于法国文学，那么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之于俄罗斯文学，正如都德的《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之于法国文学。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巴别尔是受果戈理的创作影响至大、影响程度最深的作家之一。除《骑兵军》外，“《敖德萨故事》中的游戏性和浓厚的口语色彩正是果戈理的创作，特别是其早期乌克兰作品的回响。”（Milton Ehre 1986：46）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走出来的”完全可以表述为“巴别尔是从果戈理的‘乌克兰小说’中走出来的”。

附注

1 费迪南德·奥古斯特·倍倍尔（Ferdinand August Bebel, 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和创始人之一。

2 俄语原文为“Не путайте Гоголя с Гегелем, Гегеля с Бебелем, Бебеля с Бабелем.”

参考文献

- [1]Milton Ehre. Isaac Babel[M]. Boston: G. K. Hall & Co, 1986.
- [2]巴别尔. 巴别尔全集（第一卷）[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a.
- [3]巴别尔. 巴别尔全集（第二卷）[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b.
- [4]蒂费纳·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邵炜译）[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5]果戈理. 米尔戈罗德，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建华译）[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6]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7]申丹，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Stories of “Two Ivans” — Gogol Tradition in Babel's Short Stories

Xie Chun-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20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Babel was one of the writers most influenced by Gogol's writing. There are many interrelated ways of writing between the classics in “*Red Cavalry*”, “*The Ivans*” and Gogol's novella “*How the Two Ivans Quarrelled*”. From the theme connotation, the plot mode to the character image, there are direct or explicit intertextu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texts.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mode and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the two texts can explain the multi-layered discourse connotation of Babel's novels, and help readers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tribution of Babel in the narrative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Babel; Gogol; “Two Ivans”; intertextuality

作者简介：谢春艳（196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2020-03-10

[责任编辑：刘 锐]